

那天在村里,有人带我们去看村庄的建设。田野里一排高科技大棚,路边栽好了金边石菖蒲、红花酢浆草,靠近水渠边种下了一排高大的樱花树。“明年春天,就可以来这里看樱花了!”

樱花树下,沟渠整修也在进行,工人们正把沟坎砌得整整齐齐。田边的一条道路,原来是泥泞的小路,未来也有可能铺成漂亮的游步道。

“啊——”同行的插画师发出一声惊呼,“不要……”可能意识到自己失态,她声音更轻了,“能不能留下那条泥泞小路?”

这让我想起前不久在京都,在鸭川旁边散步。鸭川是京都的重要标志,也是一条长三十多公里的一级河川。这条河水看起来并不深,但十分清澈,也许是秋天的缘故,我看到的鸭川,不过像是随意可以挽起裤脚涉流而过的清浅小溪。京都的本地人很喜欢鸭川,外国游客也喜欢来鸭川的两岸走一走,或是骑自行车,跑步。阳光很好的下午,总是有许多人坐在岸边的斜坡上,三三两两地聊天。

那次去的时候,我忽然意识到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——鸭川岸边的漫步道,中间最宽的部分居然是泥巴路。泥巴路并不平坦,还铺着一些小石子。泥巴路的两侧,倒是铺了大块的石头,石头也並不拼合紧密,石与石之间长满了野草。石头路的旁边,就是河岸斜坡,同样长满了草。我在岸边草地席地而坐,观察了好一会儿,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,京都本地人最爱走的道路,居然就是中间的泥巴路。

老太太骑着自行车过来,走的是泥巴路。姑娘们穿着裙子和帆布鞋,也走泥巴路。你可以留意到,走在铺着石子的泥巴路上,脚步一定会带起尘埃。尘埃飞扬,落在裤腿和鞋子上。如果想要干净,完全可以走泥土路两旁铺着石块的路。过一会儿,又有年轻妈妈带着姐弟俩过来玩,两个孩子就在路上奔跑追逐,尘土飞扬,不亦乐乎。

在京都当地住了几年的朋友说,就是这样,京都本地人好像很喜欢这样的泥土路。要是下了雨,这条路也会变得泥泞,人们就会走两侧的石头路。但只要天一晴,路面干了,人们还是爱走泥巴路。好像当地人偏爱泥土一样。日本的学校操场,沙土操场也是极其常见了,甚至很多历史悠久的公园,至今都是砂土路面,并没有硬化。“或许,人走在沙土路面上,会比水泥路面更有亲近自然的感觉吧。”

从田间回来,插画师问:“能不能留下那条泥泞小路?”这一片田野,未来可能会有很多中小學生走过,他们走过一段路,走进高科技的大棚去看作物的生长,也能学习育种或栽培的知识。如果有一条泥巴路留给孩子们,下雨天可以踩一踩水坑或泥巴,晴天可以踢一踢石子,也是一种特别的记忆吧。田野原本是自然的,那就留下一小部分田间小路,留给自然,也留给野草和泥泞。

松软的泥土路,真的是很难得了。水渠边的小路,未来有可能会变成漂亮的游步道,只是,我们身边并不是缺少一条那样的游步道。城市的道路与公园太常见了。而我们要知道,田野并不是只有人来人往,还应该 有露水、蚯蚓、杂草、野鸟、篱笆、庄稼,应该有落叶、松针、花瓣和尘土飞扬。自然不是一片单一的公园,其实它更应是一片旷野,那里杂草丛生。留下一条泥泞不堪的小路,其实是提醒我们自己,在跟大自然相处时,常常要记得不是可以 做一点退让。

曾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,《不然你搬去鸭川啊》。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,说不定有一天你也可以说:“不然你去走那条泥巴路啊。”

山边有一个湖,湖中有一所学校。

湖是一个很普通的湖,在河道纵横、湖泊星罗的宁绍平原上,这样的湖是要多少有多少。虽然关于这湖也有美丽的传说:一个姓周的人骑一匹白马入湖仙去,所以湖便有了这个名字。但类似的传说也是要多少有多少。

“北有南开,南有春晖”的赞美,早使白马湖和春晖中学名声远扬。但使这里声名鹊起的,并不是旖旎醉人的湖光山色,也不是作为一所私立学校敢于破除教育的陈规陋习,独领风气之先的不凡实绩,而是因为那群了不起的人,他们受当时的春晖中学校长、著名的教育家经亨颐先生之聘请,风云际会,云集于这个隐匿于杭甬铁路边上的乡间小湖。

经亨颐在浙江一师的教育改革遭到了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,并为当局所不容,因“一师风潮”愤然离开杭州,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。他的教育生命在白马湖畔

缘画红楼忆故人

王悦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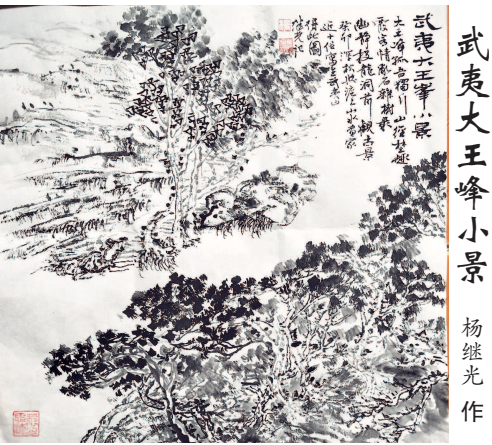
2024年元月,有着“民间艺人”之称的著名画家戴敦邦先生已是87岁高龄,谁能想到,耄耋之年的他又为喜爱“戴家样”绘画的读者们带来了新作——《红楼梦续梦敦邦新绘墨稿》。整整351幅作品,几乎都是之前不曾画过的情节与故事,蔚为大观,令人感动。

从1979年为杨宪益、戴乃迭夫妇翻译的《红楼梦》画插图开始,几十年来,戴敦邦几乎画全了各种各样版本的红楼人物。年过八旬,他原本以为自己今后可能不太会有机会再拿起画笔,创作红楼组画了,可谁能想到,2019年金秋时节,戴敦邦因为《红楼梦》又一次与上海评弹团结缘——《书画红楼》评弹、国画专场在田子坊连演两天,引起轰动。这场别出心裁的演出,竟让台下的戴敦邦大为感动,一时间又一次豪情满怀,不顾年高,当场立下宏愿:“有生之年,我还要再画一遍《红楼梦》!”

就这样,寒来暑往,夜以继日,自诩为“三敦居民”(三敦者,曹雪芹好友敦诚、敦敏,与旷代知音敦邦也)的戴敦邦每天的日常,都与《红楼梦》息息相关——凌晨三点半即起,调朱弄紫,笔歌墨舞,用心描绘心中的红楼梦故事。除了午饭后休息个把小时,下午不是继续创作,就是精读原著,找寻画面与灵感,几乎每天都要画到夜晚华灯初上才止。一天24小时,他用在画画上的时间几乎超过十个小时,简直比年轻人还拼命。

整整四年光阴,靠仅有的半个眼睛视力,一支笔、一块砚、一本书,许多精彩的画面一一在宣纸上展现。面对赞扬,戴先生却非常谦虚,他坦言,毕竟自己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,眼睛又不好,创作期间还经历了新冠疫情的肆虐,画得相当辛苦。耄耋之年的“民间艺人”,为了至爱的《红楼梦》,这次真可谓“拼老命”矣!

画红楼,忆故人,往事历历在眼前。戴先生回忆,1986年春天,有关方面组织了一次红楼梦主题的文艺晚会。当时,主演越剧电影的表演艺术家徐玉兰、王文娟等与红学专家、画红楼的画家济济一堂。画家方面,来了擅长画红楼仕女的刘旦宅、戴敦邦和韩敏三位先生。那次聚会刘旦宅和戴敦邦分别坐在王文娟老师左右两边。心直口快的刘旦宅对王文娟看了许久,脱口而出:“电影里你的林妹妹很漂亮,台下看看,其实还好嘛。”戴敦邦赶忙拍了拍老朋友,提醒道:“老刘,女士面前,怎好这样说?”耿直的刘旦宅哈哈大笑:“事实嘛!”没想到,身边的王文娟老师丝毫不以为忤,反而淡淡一笑,对刘先生说:“作为演员,能把最美的艺术形象留给观众,就满足了。生活中我就是个普通人。”刘旦宅闻言对王文娟跷起了大拇指。不久,一张由他精心创作的《黛玉葬花》送到了王文娟手上,上题道:“文娟大家艺术精湛,其演黛玉缠绵悱恻,满座为其倾倒,今嘱作葬花



武夷大王峰小景

杨继光作

的歌曲;当然,夏丐尊来了,朱光潜也来了,蔡元培、叶圣陶、胡愈之、黄炎培、陈望道、何香凝、张大千……他们约好了似的,来到白马湖畔,演绎了中国教育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一段佳话。

自然山水和文思泉涌的美丽邂逅,使白马湖山清水秀的灵气汇成一川清流,涌进了现代文学史的长河。他们或杂文随想,或随笔感悟,或漫画寓意,或诗韵抒发,夏丐尊的《春晖的使命》,朱自清的《春晖的一月》,丰子恺的《山水间生活》,朱光潜的《无言之美》皆为文学楷模,“白马湖文学流派”也由此发初。

这不仅是春晖之幸,更是白马湖之幸。夏丐尊在《春晖的使命》中,庄严地宣告了使命,一方面打算树起“真正的旗帜,振起纯正的教育”,另一方面,春晖中学“所以设在白马湖者,是想感化乡

上午在开着暖气的房间里,我竟感到一丝寒意,就在单衣外面加了件背心,霎时感觉暖和了许多。在这冷暖转换的瞬间,我想起万里之外的母亲,想起她在几十年前的严寒如何帮我御寒。

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。那时候的冷,是天寒地冻,是无缝不入,是几尺长的冰凌儿挂在屋檐下几个星期都不掉下来,是池塘里的水冻成了深绿色的玻璃,鱼在里面封住动弹不得。

几乎每个冬天,我的手上、脚上都会留下冻疮。上小学的我感觉冬季每天的晨读课是那么难熬。学校没钱给教室的所有窗户安装玻璃,就用尼龙纸糊住窗扇;风会把窗纸刮得啪啪地响,那响声与孩子们冻得直抽鼻涕的声音此起彼伏;教室单薄的土墙既不保暖也不隔热,室内室外温度几乎一样。每个人的手和脚都冻得生痛,一心盼着下课铃早点响起,可以回家吃早饭。

童年时有许多游戏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开心,只有一样除外:一个年级的孩子涌到墙角,大家挤在一起,摩擦生热,我们称之为“挤暖”。这个游戏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都玩。我们的身体和衣服被墙磨得光滑,但暖和只保持在挤挤攘攘的那一会儿——大家四散之后回到教室,冷更甚于“挤暖”之前。

母亲是位裁缝,手艺很好,东家请西家接地到人家家里做衣裳,按说应该有些收入,但大多数农户都穷,做衣服的费用往往要拖到“年关”才结算,甚至要赊好几年。母亲东拆西借,缝缝补补,尽量让四个儿子穿暖些。每个冬季,我都穿上了棉袄,但我的棉袄袖子总是短了一截儿——其实并不短。我性别意识觉醒得早,母亲给我做的冬衣的里子,用了些红绿的布料,我将就了,但冬衣的面子有时竟有一小半是深红色的,甚至还带点图案。我已顾不得那么多,因为实在太冷,也没有选择了。

我后来明白有衣服穿就已经很不错

图,未能仿佛其万一,惭愧惭愧。”如今,两位大师皆已仙逝,这坛精品,见证了一段艺坛佳话。

当天聚会的高潮,自然是书画家留下墨宝。擅长书法的刘旦宅大笔一挥,写了一张草书的“虎”字,写完,不无得意地看看戴敦邦,颇有点“给你点颜色看看,你行吗?”的味道。戴敦邦自忖书法不及老友,忽然灵机一动,拿来宣纸,写下两个大字——“大虫”。盖“虎”者,不过“大虫”也……回忆起这段往事,戴敦邦感慨万千:“我和老刘都画人物画,都画红楼梦,几十年来我们之间又‘联合’又‘斗争’,但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友情。要知道,我们的本事就是这样互相‘斗’出来的。老刘八十岁时走了,太

了。那时正赶上经济困难时期,买布料要凭“布票”。爸爸是家里的劳力,我们放寒假时他也得早出晚归干农活,有时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参加“兴修水利”的工程。家里最困难时,粮食不够吃,奶奶要保证家里主要劳力一天三餐伙食,不得不狠心只给我们吃两顿主食——晚上让我们吃点炒米之类的东西,就得很早哄我们钻进被窝,因为被窝里暖和,睡着了晚餐也省了。

这么冷的天,母亲也得天天赶路,去给人家做衣裳。她系着一条鹅黄色的围裙,围巾很好看,但其实很单薄,围着它抵御朔风,聊胜于无。她脸上、手上也有好几处冻疮。

我猜想我的母亲在给富户人家的孩子缝制厚棉衣时,一定想起了她的儿子,特别是她的那位叫冷叫得最厉害的二儿子,也就是我。这个猜想的证据是:有一天母亲收工回家,给我带回了一把棉花。她把棉花扯开了塞进我的暖鞋和针织手套里,让我这样穿戴着上学。

我记不起来那是不是真的就让我暖和了些;我只记得母亲很认真地塞棉花,我在一旁也很认真地看着,毫不怀疑那样会让我更暖和些。我还记得就是在那前后,爸爸妈妈为给我治冻疮,在灶火里把萝卜烧得半熟,用热萝卜擦拭我脚部和手背冻伤的地方。

那一把棉花,我记到了今天。依稀听母亲讲,她三四岁时,那还是在1949年前,随着她的妈妈,也就是我的外祖母到外村要饭。她那时候是懵懂的小女孩;她妈妈会把乞讨到的热饭菜留给她。这是在那样的处境中她的母亲唯一能做到的。

母亲在严寒的冬天,在冬衣御寒不够的情况下,那么无奈而又自信地给我鞋子里,手套里塞上一把棉花。这是在那样的处境中我的母亲唯一能做到的。

那一把棉花啊,温暖我到如今。

可惜了,我挺想念他。”作品着色,以完成其全貌。这也是我献给多年来热爱“戴家样”艺术的读者朋友们的一份诚挚的心意。”这是戴敦邦先生发自我还将继续创作,为这套肺腑的感叹与期待。

小女孩球球送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礼物,让10岁生日过得活色生香。7岁开始,球球就留起了头发,她渴望有一头飘逸的长发,用来甩去有动感美,盘起来又飒。球球参加的舞蹈队、沪剧演唱班的老师都要求学员尽量留长发,这是上台演出的需要。哪知一个瞬间就颠覆了预定目标。偶然在广播里,球球听到上海有“爱从‘头’开始”为白血病患者捐发的公益行动。球球被捐发姐姐的事迹所感动,献出一片爱心,为白血病儿童捐发,让他们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。球球对妈妈说出自己的心愿:留长头发捐给患病的小朋友!

球妈是一位“虎妈”。她说,既然你下了决心,那以后洗发、吹风都得自力更生,护理好你的头发。长发留到30厘米后,“咔嚓”一下变成一头短发,舞蹈队、演唱班的演出怎么应付也得想好,到时再哭鼻子就来不及了。球球向妈妈保证,捐发之事决不后悔。

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。8岁孩子自己洗发、吹风,还要坚持精心护理好长发,真不是件容易事。球球的日记里记下了心路历程:“头发长得慢慢,何时达到30厘米?‘你不想盘发跳舞了吗?’‘可怜的人需要帮助啊’,两个小人常在我脑海里争辩。”“好不容易头发有30厘米了,可得到的消息是现在要35厘米了。唉,又得继续养好头发……”

10岁生日前夕,妈妈带球球去理发店。店里的一级美发师精心为球球洗发、抹油,编好一条长辫子,然后“咔嚓”剪下来交给球妈。美发师赞球球的长发质量高,也赞她能这么无私慷慨捐赠爱发实属不易。看到精心呵护了两年的长发一下子离开了自己,球球不由得掉下了眼泪。但拿到捐赠证书时,球球笑了:“生病的小朋友很痛苦,我用自己的真爱给他们带去一点安慰和鼓励太重要了,所以我不怕别人说我短发不美丽。再说,妈妈帮我准备好了演出用的发套。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,它培养了我的耐心和恒心。这是我给自己10岁生日的礼物——献爱从‘头’开始,留长发也从头开始。”这些感悟球球都写进了日记,这是她成长的真实记录。

为球球喝彩,为有爱心的小朋友喝彩。

养 育

